

鄧小平在 1957 年中共整風 、「反右派」中之角色

鍾 延 麟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摘 要

中共在 1957 年發動的整風、「反右派」運動，迄今屆滿 50 年。然而，對於當年在運動中特定人物所扮演的角色和責任問題，卻還有諸多不明之處。時任中共中央常委、總書記的鄧小平，晚年自承當年在運動中是積極分子，但現有的相關研究卻嚴重不足，出現中國大陸對之模糊迴避，西方僅能點到為止、不能深入的情形。在文獻分析與訪談的基礎上，本文認為，基於對毛澤東看法的遵從、自身對黨的愛護與執著，以及所任黨職與運動的關聯性，鄧小平無論在整風或是對「右派」進行回擊的運動各個階段，不但是高度參與決策，更直接經其領導的中央書記處擔任部署實施、具體執行運動的角色，作為毛澤東以外，對運動介入最深的領導人，甚至形成「主事在毛、成事在鄧」的格局。鄧小平強勢的個性與對運動投入之激情，循由黨機制對於中央各部門，以至於地方上運動的加溫發展，皆產生推波助瀾的影響。鄧小平確實在運動擴大化上負有重大的責任。本文對於「鄧小平研究」與相關中共政治史的認識，乃有補遺拾闕的價值與意義。

關鍵詞：鄧小平、整風運動、反右派鬥爭、中央總書記

* * *

壹、前 言

中共在 1957 年發動的整風、「反右派」，迄今剛好屆滿 50 年。該運動對中國大陸之後的發展所造成的嚴重危害和負面效果，雖已眾所週知；然而，對於當年在運動中特定人物所扮演的角色和責任問題，卻還有諸多不明之處。

鄧小平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中央總書記，政治地位甚為突出、顯赫，鄧晚

年自承當年在運動中是積極分子。但是其在運動中的角色和活動，現有的相關研究卻異常的嚴重不足，亦即出現中國大陸對之模糊迴避、西方對之僅能點到為止的情形。

中國大陸現有探討鄧小平的專著，論及此一運動，特別是「反右派」之時，出於「為尊者諱」的需要，對於鄧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不是顧左右而言他，就是根本未置一詞。其自身的學者對此雖也期待變化，但這種情況在短時之內恐亦難有突破。中國大陸境外，特別是西方對鄧小平的研究著作，涉及有關主題時，雖不會像中共大陸同行那樣避之唯恐不及，較能明言說出鄧小平在運動中的重要地位。然囿於資料的稀缺（主要是中共官方刻意地限制），也往往因缺乏過程與細節的討論而難以深入。

鄧小平當年對整風、「反右派」持以什麼態度與立場？影響鄧小平參與其中的因素為何？鄧小平在運動中，尤其是展開「反右派」後扮演何種角色、採取哪些作為？仍是一個研究上的空白和缺憾。經過有計劃的文獻蒐集與訪談，^①本文在初具條件的情況下，嘗試對前述問題進行解答。

本文論點為：基於對毛澤東判斷的遵從、自身對黨的愛護與執著，以及所任黨職與運動的關聯性，鄧小平無論在整風或是對「右派」進行回擊的運動各個階段，不但是高度參與決策，更直接經其領導的中央書記處擔任部署實施、具體執行運動的角色，作為毛澤東以外，對運動介入最深的領導人，甚至形成「主事在毛、成事在鄧」的格局。鄧小平強勢的個性與對運動投入之激情，循由黨機制對於中央各部門，以至於地方上運動的加溫發展，皆產生推波助瀾的影響。鄧小平確實在運動擴大化上負有重大的責任。

本文之目的在於：試圖勾勒出鄧小平在 1957 年整風、「反右派」中的政治意向和活動情形，冀以對「鄧小平研究」和相關中共政治史的補遺拾闕有所裨益。文內的章節安排，除此前言外，概有 4 個部分：一、討論影響鄧小平與聞整風、「反右派」之因素；二、檢視鄧小平在整風醞釀和展開期間的態度與活動；三、探討鄧小平對「反右派」的投入與作為。^②最後，在結論的部分，對鄧小平在相關運動中的地位與責任，作一簡單的概括，並探討本文研究的現實意義。

貳、影響鄧小平相關態度與行為之因素

一、對毛澤東的信從

毛澤東從戰爭時期到中共建政初期，其在中共高層中所積累、形成的崇高權威，

註① 本文使用的文獻，除包括公開的中國大陸回憶資料、中、西研究專著，以及「文革」期間的揭批材料，要特別指出的兩筆資料是：華東師範大學沈志華教授慷慨地將其計劃出版的專著，讓作者先行引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特殊館藏。其為本文的探討提供了重要依據，在此一併表示感謝。另外，本文也利用作者在台北、香港、北京所做的訪談所得，作為文獻資料以外的重要補充。

註② 受限於資料的因素，本文探討的時間範圍集中於：1957 年初中共醞釀整風至同年秋中共宣稱對「右派」的鬥爭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是觀察當時中共領導人政治立場與行為取向的首要線索。

出於對毛澤東政治視野與領導能力的敬重和佩服，毛的政治倡議，其他領導人都極為重視、視為英明，例如：毛提出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作為安國興邦之策；中共自身相應要勵精圖治，透過整風以具備更好的執政條件與能力。中共領導層內無一不予支持、肯定，咸認為毛洞燭機先。

雖然在整風的方式上，領導人之間看法可能有一些差異。但一旦毛澤東表明態度要以訴諸黨外、群眾的方式行之，也莫不以之為準，不敢違背。鄧小平晚近才在中央接觸黨務，干係不深，鮮受羈絆，^③對毛提議的對黨整風方式，自始即無排斥。當毛澤東感到有人藉機肆意攻擊中共、意圖謀反，登高一呼展開對「右派」的反擊，朝中重臣更是無人不從，唯恐落於人後，鄧小平自不例外。

除了政治上的「以毛是瞻」，鄧小平自 1952 年上調北京以後，在毛澤東的提攜下，短時之內迭次拔擢，1956 年的中共「八大」，毛澤東更親自為鄧介紹、宣傳，薦其出任中共中央常委與中央總書記，從而使鄧步入中共最高領導核心。對於毛澤東的器重，鄧小平誠惶誠恐。隔年由毛發起的整風、「反右派」，鄧小平就算不搶立新功、急爭表現以回報感遇之恩，或也有不願辜負毛所望的心理。^④

二、捍衛共黨政權的信念

鄧小平是親身參與中共政權建立的第一代領導人，長年的獻身革命，使之對中共有濃厚的生命共同體之感。不但自覺與之是「同呼吸、共命運」，更有「黨國興亡，匹夫有責」之志。

每當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提出以整風的方式對黨加以整頓，以利其後續健康發展時，出於為黨、為公的信念，鄧小平都是欣然響應、態度激昂。抗日時期在華北太行根據地的鄧小平，積極貫徹黨的整風，甚至迫使延安中央來電糾偏；^⑤ 1957 年，已高居黨組織金字塔上層的鄧小平，或同是「愛之深責之切」，對於斯時黨內可能存在的「藏污納垢」，也不循私情，懲以重手。

同樣是出於護衛共黨的真切心理，1956 年「匈牙利事件」，鄧小平極力主張蘇聯紅軍強力干預，壓制所謂的「反革命勢力」。^⑥對於他國共黨安危尚且如此關心，對於中共自身，更不容忍他人對之染指與詆毀。在中共鼓勵黨外對黨提意見時，所出現的一些直指中共施政弊病、懷疑中共治國能力，甚至是直截批評包含鄧小平在內的中共最高領導層的議論。^⑦鄧小平和多數的中共黨人，對之易生惡感，難以坐視。再加上，

註③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202, 227, 288.

註④ Benjamin Yang, *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 (Armonk, N.Y.: M.E.Sharpe, 1998), p. 138.

註⑤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550-551。

註⑥ 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師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469。

註⑦ Roderick MacFarquhar ed., *The Hundred Flowers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New York: Praeger Inc., 1960), p.108.

當年常見於各級幹部的慣從意識形態作思考的傾向，對於毛澤東對相關情勢以階級鬥爭角度的解讀，既可心領神會，也能應用發揮，戮力「對敵鬥爭狠」。

在「反右派」問題上，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站在運動第一線的李維漢晚年表示：「當時中央認識上是一致的，沒有提出不同意見」。^⑧易言之，位列中共層峰的鄧小平，對相關問題的所持的立場、觀點，與毛相差無幾、所去不遠。

正是鄧小平自身對維護共黨政權的意志和敏感，所以即便毛澤東離世後，鄧回顧此一歷史時，仍念茲在茲反覆強調：「人家要殺共產黨」。^⑨「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⑩除堅持當年發動「反右派」的必要性，鄧也反對舉行相關的紀念活動。^⑪基於同一的動機，1989 年鄧小平下令採取強硬的手段對付抗議中共的市民與學生。^⑫

三、鄧在黨組織中的職位與運動的關係

鄧小平在 1956 年中共「八大」被推薦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並領導中央書記處。此一職位從兩方面讓鄧小平處於 1957 年整風、「反右派」的核心位置。

一方面，就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定位，中央書記處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常委會領導下，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之機構。毛澤東一手主導的整風、「反右派」，其重要的決策一旦在政治局與常委會做成，按照組織的程序和黨紀的規定，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就要將之付諸實施，鄧小平因此膺任運動執行者的角色。然而，鄧小平也並非是完全處於被動執行的地位，針對運動的需要，鄧小平與中央書記處通常要先予討論並提出方案，以供決策參考和選擇。亦即，鄧小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縮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的決策範圍。而且，鄧小平也是中共常委，屬於最高決策圈的一員，在參加中央對運動的決策時，鄧可算是「有備而來」，自享有其他常委所不及的特殊發言地位。另外，由於鄧小平所任的中央總書記，領導負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運動期間，黨的中央部門和地方黨委有事向中共中央請示、匯報時，鄧小平有時即可以黨中央的身分自行予以裁示、定案，直接對運動造成影響。^⑬鄧小平白首憶往時，就特別指出其所任職位在運動中的分量：「1957 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

註⑧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年），頁 839。

註⑨ 于光遠，*我憶鄧小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頁 231。

註⑩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1975—1982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258。

註⑪ Ming Ruan, *Deng Xiaoping: Chronicle of an Empir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p.166.

註⑫ 中國大陸某當代中國史研究者對本文作者指出，在「反右派」問題上，「對鄧的分析，要看到老一輩人在維護政權上這個問題上的堅定立場。」其並指出 1957 年「反右」與 1989 年「六四事件」，鄧小平皆是基於同一立場採取強勢的作為。

註⑬ 鄧小平在 1957 年相關運動中發揮重要影響力的職位，有一種頗為普遍的說法是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的組長或主任。本文作者曾就此問題先後訪問 4 名中國大陸的中共黨史研究者，得到的回應包括：「未曾聽過」或沒有此一小組的設置。本文傾向於後者，因為鄧小平身為中央總書記，即可經由中央書記處對運動予以籌策、指揮以及調度。

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⑭

另一方面，中央書記處雖然作為「什麼事都要管」的「黨中央的辦事機構」。事實上，在 1958 年「大躍進」中央書記處進一步擴權以前，其主要還是以管理黨務為主。鄧小平在「八大」上即是專門針對黨的問題作專題報告。1957 年的整風，其實質就是對黨的一次革新除弊的嘗試。領導中央書記處的鄧小平，不但不可能在此次黨的建設中缺席，相反地，這正是其職責所管的業務範圍。運動「變調」為「反右派」後，也是鄧小平調遣各級黨委從事對政治異己的「獵捕」。因此，就業務執掌的關係，鄧小平參與運動的程度，很容易就超過毛澤東以外的所有中共領導人。

叁、鄧小平在整風醞釀與展開期間之立場與作為

一、整風醞釀的階段

1956 年秋冬起，中國大陸因受國際上「波匈事件」的影響，以及國內先前急促的社會改造和失衡的經濟投資所造成的效應，致使政治和經濟領域皆出現不小的波動。

中共中央，特別是毛澤東不失敏銳地提出要區分處理不同性質矛盾的問題，尤其是所謂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統領政權的中共各級幹部，對之若處理不慎、失之簡單粗暴，就有轉化矛盾性質、引發黨群關係緊繃，甚至離心離德的危險。毛也提出或肯定一系列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具體方針，舉例大者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等。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所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乃是最能集中體現毛澤東相關思想的成果。

毛澤東引領全黨進行新的探索的過程中，並不如預期的順遂。除了在中共各級幹部間存在不理解的態度和不情願的情緒，傳聞中共領導人內部對於整風的問題根源與側重面、推行的具體方式，也有所歧異。然而，對於毛澤東的相關倡議，鄧小平是亦步亦趨，從旁輔弼、協助推動，予其實質的支持。^⑮

首先，針對各地學校因近期內、外情勢變化而出現躁動不安的情況，以及由此顯

註⑭ 鄧小平，「堅持黨的路線，改進工作方法」，鄧小平文選（1975-1982 年），頁 241。

註⑮ 在醞釀整風的階段，有關鄧小平的態度，論者之間有不同的觀點。例如：胡績偉認為，對於毛澤東的新政策，鄧小平和劉少奇一樣保守。Goodman 認為，鄧小平與毛澤東對於整風有著不同的理念，鄧主張在黨內展開整風，並建立公眾監督中共活動的機制；毛主張用群眾動員。楊炳章認為，鄧小平保持著謹慎的中立，靜觀事態的進一步發展，摸清毛澤東的真實思想。MacFarquhar 則指出，鄧小平強力支持毛澤東倡議的「雙百」方針，在整風運動的方式上想法一致。本文在這問題上的看法與 Macfarquhar 相近。胡績偉，胡績偉自述，第 2 卷（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 年），頁 89。David S. G. Goodman, *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57-59. Benjamin Yang, *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 p.139.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p.178, 191.

示中共相關政治思想工作未能跟上的缺點，在毛澤東的示意下，1 月 12 日，鄧小平到清華大學為上萬名師生作形勢報告。鄧小平報告內容甚為冗長，主要包括 5 個問題：中共當時對以「匈牙利事件」為主的國際情勢的判斷與立場、對中共所行制度和政策的辯護、對民主和專制問題的看法、對蘇聯應有的態度，以及艱苦奮鬥的要求。^⑩

其中值得指出的是，鄧小平當時對「雙百方針」的看法。鄧肯定此口號的提出，認為「對科學、藝術的發展起了很好的作用」。鄧進而表示，此口號是在「思想改造取得相當成績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亦即「馬列主義思想取得了領導權、馬列主義的旗幟樹立起來了、唯物主義的旗幟樹立起來了」。以此為前提下的「百家爭鳴」，「放出來就有好處」，既能讓自身思想不流於僵化，也可經由競爭轉化主張唯心主義的人，「使真理越爭越明」。易言之，鄧小平相信中共此前在思想領域裏是經營有成並佔有主導地位。鄧這種頗有自信的判斷，在後來面對黨外人士對中共直抒己見，以及顯露出其思想的「口服心不服」之時，鄧心理和認識上恐要做不小的調適。

對於鄧小平的長篇大論，現場聆聽者的反應為何，或有爭論，但是毛澤東確是頗為滿意。其在同月召開的中共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就表示：「工、農、商、學、兵、政、黨，都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現在我們的總書記鄧小平同志，親自出馬到清華大學作報告，也請你們都出馬。中央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領導同志，都要親自出馬做政治思想工作。」^⑪毛澤東期望在鄧小平身作表率、「一馬當先」之下，帶動中央和地方的黨委領導有樣學樣地盡快向所轄部門或地域開展政治思想工作，除澄清思想，安定情緒，也表明中共黨人願意與民溝通、向民解釋的誠意。鄧小平的此一演講內容，後也作為重要文件代表中共官方立場傳達到黨外。由於其中首次透露了一些在京附近的高等學校發生波動的情況，這在中共此前資訊封鎖下乃無法聞知，還引起在外地的黨外人士的一陣訝異。

其次，為展示以毛為首的中共中央欲妥善處理社會矛盾的心志，鄧小平與其領導的中央書記處，開會研究相關問題，^⑫並擬定指示、規令。例如：3 月 7 日，鄧小平主持完成了 3 個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中央關於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關於在企業中加強群眾監督的指示》、《關於研究工人階級問題的通知》。報送毛澤東審閱後發出。^⑬

再次，對於中共中央剛確認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政治主題，鄧小平與其他常委各自到外地進行宣揚與推廣。毛澤東沿巡華東，劉少奇下行中南，鄧小平則在 3 月底、4 月初橫走華北，駐足山西、陝西、甘肅，頗為賣力地推銷中央的新方

註⑩ 「鄧小平在清華大學的講演」，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鄧兵團編印，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文章匯編（文革時期揭批材料），第 2 集（1967 年），頁 4-19。

註⑪ 中共北京市委，「鄧小平同志對北京市的關懷和激勵」，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20。

註⑫ 例如：2 月 28 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有關部門負責人的會議，討論《關於處理罷工、罷課、請願問題的指示（草稿）》。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年），頁 445。

註⑬ 李羅力編，偉大生命的歷程—鄧小平全記錄（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年），頁 163。

針。鄧小平在跨省之旅期間，相關講話的要點有：一、中共領導國家要能長治久安，就得不斷自省，「從思想上經常洗臉、掃地」。^⑳二、針對當時層出不窮的群眾鬧事問題，幹部若能區別對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則可以將之杜絕。^㉑三、為避免「脫離群眾，犯大錯誤」，中共必須接受黨內、群眾以及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監督。四、以蘇聯殷鑒不遠為例，宣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㉒鄧小平在西安所作的相關談話，因內容顯得其政治開明，在 1980 年代末還被選入鄧小平文選。

二、發動全黨整風（4 月底~5 月中）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

著眼於此前黨內對於整風的不甚積極、消極對待，毛澤東決定引進黨外的聲音以推動黨內的整風。1957 年 4 月 30 日，第 12 次最高國務會議召開，討論有關開展整風運動的問題。毛澤東在會議講話中表示歡迎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毛在講話中指定：「由鄧小平同志負責找黨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學社等開座談會，對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的問題徵求意見。」^㉓對於毛澤東指派鄧小平代表中共向相關黨派和人士「虛心求教」一事，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也有同樣內容的回憶。^㉔

此後，中共中央統戰部從 5 月 8 日至 6 月 3 日，分別召開 13 次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 25 次工商界人士的座談會，徵求對共黨整風的意見。在此一過程中，由毛澤東欽點過問此事的鄧小平，一方面曾親自出面與談；^㉕另一方面，循由黨的機制與程序，鄧小平不但能知曉、指導李維漢和統戰部有關工作的推動，例如：統戰部不時向上級機構中央書記處上呈報告並請求指示。對於座談中出現的各種言論主張和觀點，即使鄧小平沒有親臨會場，由於李維漢「即時向中央常委匯報」，^㉖身為中央常委之一的鄧小平，亦是能夠藉此一手掌握其進展與動向。

整風以來，從各方「鳴放」出來的意見中，主要是針對中共黨的弊病的指陳與揭露。由於此正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發動整風之初衷，相關問題的被提出，的確

註 ⑳ 中共山西省委，「山西人民永遠懷念小平同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下冊，頁 76~77。

註 ㉑ 鍾文、鹿海嘯編著，百年小平，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頁 251。

註 ㉒ 鄧小平，「共產黨要接受監督」，鄧小平文選，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270~273。

註 ㉓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頁 672。

註 ㉔ 李維漢，前引書，頁 831。

註 ㉕ 北京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提供的訊息。

註 ㉖ 李維漢，前引書，頁 833。

引起毛澤東等高度的關切和憂心。^⑦負責處理黨的日常工作、站在前列的鄧小平，對於黨此前工作的缺點與造成失誤的體認，必也不下於毛澤東。因為值此前後，鄧小平正在處理1956年發生農民逃荒和死亡的「廣西事件」。^⑧

鄧小平領導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在5月15日、20日聽取有關部門以及廣西省委領導的情況匯報。「廣西事件」反映出中共黨國幹部脫離群眾的嚴重性，讓鄧小平既震驚又生氣。20日，主持會議的鄧小平在會上表示：

這次事件是在國家有錢有糧的情況下發生的。而且事件發生後，省委對有關失職人員一直拖著不處理，患得患失，你推我，我推你，不僅缺乏群眾觀念，連「人民」兩個字的觀念也沒有了。根源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問題的性質是嚴重的，主要責任在省委。中央決定要嚴肅處理，早處理早主動。這樣，才能使群眾心服。…你們回去要召開縣委書記會議，好好總結經驗教訓，使廣西的工作作風來個根本改變。書記一人包辦的作用是很壞的。「人民」二字在心中有沒有位置？沒有受處分的同志也要進行自我批評。省委自己要作出一個決議來教育來全黨，這是開國以來第一次處理的一件大事，應引以為戒。^⑨

當整風「鳴放」揭露出中共此前工作上存在諸多的弊端，讓中共領導人進一步認識到發動整風的必要性的同時，對情勢觀察入微的毛澤東，也警惕地注意到另一股雖較小但卻對中共領導地位直接提出質疑與挑戰的輿論，正在逐步蔓延與擴大。^⑩中共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認為這些對中共統治頗有微詞者，必是言猶未盡。乾脆引誘其一吐積怨，既可讓之繼續道出中共治理上一些確實引人詬病之處，也能趁此測試其背離中共的程度。此外，也必定還有不少的異議者仍保持緘默、處於觀望，促其發聲，可以發覺他們的蹤跡並估量其社會能量的大小。

肆、鄧小平對「反右派」之立場與作為

一、決定「反右」方針與「引蛇出洞」(5月中~6月初)

毛澤東在全黨整風的過程中確定「反右」方針的時間，學界普遍的看法是5月中旬。一方面，毛澤東寫出「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其中指出：「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

註⑦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381。

註⑧ 1956年1月至7月，廣西省平樂專區和橫縣等地，因1955年減產報增產、層層加大糧食徵購任務，以及地、縣委壓制幹部和群眾反映災情，餓死近1500人，逃荒約12000人，患浮腫病者有15000人。「廣西省平樂專區和橫縣大批餓死人的情況」，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北京），總第2180期（1957年4月16日），頁3-6。該省省委書記陳漫遠因此事而遭到撤職。

註⑨ 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壯鄉人民永遠懷念敬愛的鄧小平同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下冊，頁296-297。

註⑩ 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台北：允晨文化，2001年），頁88-94。

頂點。」^①另一方面，5 月 14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其中指出，各地報紙應該充分報導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使群眾明瞭他們的面目。5 月 16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其說：「要放手讓『帶有反共情緒的人』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②至此，中共「引蛇出洞」的運動方針，幾已確立。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提出「反右」方針的過程中，鄧小平保持著高度的參與。首先，在此前後中共最高領導層密集的小範圍人士的會議中，鄧小平皆與會參加討論。例如：據推斷與討論整風「鳴放」有高度關係的 5 月 14 日、16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皆有鄧出席的記錄。^③5 月 18 日、19 日、20 日，一連 3 天的人數不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鄧小平也都作為出席者。^④經由密切的意見交換，無論是出自本身對問題的認識或是組織上紀律的要求，鄧小平與毛澤東、黨中央無疑能保持對運動想法的一致。

其次，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與常委會辦事機構的中央書記處，為呼應前者新確立的運動方針，尤其是首重在新聞輿論上的「讓敵暴露」和「按兵不動」，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即著手進行配合與佈置。例如：針對前述的 5 月 14 日發出的《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5 月 16 日，在討論整風「鳴放」問題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⑤鄧小平進一步地加以闡釋：

報紙把壞話刪掉，實際上是幫助他們，現在應讓他們說完，應在新的基礎上團結中派。一是黨改變作風，一是右派教育他們。現在報紙上為右派粉飾。對各種言論不要駁，到一定時機黨內也打打招呼。有三個東西不能登：對物價有影響的，涉及外交政策，涉及肅反的。現在不放不利，右派還沒有出頭。^⑥

從鄧小平簡短的語言中，既可以看到中共竭力要讓所謂「右派」暴露的意圖，也可注意到執行運動的鄧小平，謹慎防止若干敏感領域與議題的不當發酵。鄧強調不能登載的「三個東西」，影響的層面都相當的廣泛。例如：物價波動會影響民眾生活，進而引發人心浮動。所謂「涉及外交政策」，實質指的是對中蘇關係，尤其是對「一邊倒」國策之議論；由於蘇聯對中共所提的「雙百方針」本有保留，報刊若再公然出現批蘇文字，勢將引發雙邊的外交糾紛。至於「肅反」，因為該運動牽涉不少的人數，若經炒作恐有重議翻案的風潮。由此可見，鄧小平雖努力煽起哄鬧、熱烈的運動情勢，但也注意維持總體局面的穩定。事實上，中共如此也才能專心地因應「右派」捲起的

註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634-635。

註②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中卷，頁382。

註③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90-691。

註④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403。

註⑤ 徐則浩編著，前引書，頁448。

註⑥ 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的講話，1957年5月16日，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未刊稿）。

「茶壺裏的風暴」，並且如其所意地操作運動的走向。

在努力暴露「右派」的同時，中共開始為開展「反右」鬥爭積極進行準備。5 月 20 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指示各省市黨委，「必須積極指導宣傳部門和黨報立即著手分類研究右翼的反動言論和其他資產階級論點，準備在適當時機（中央屆時另作通知）發表一批論文和社論，予以反駁和批判」。^⑳鄧小平及其領導的中央書記處，自然不得閒。

5 月 21 日和 25 日，中央書記處連續召開會議，研究報紙宣傳報導問題和組織文章爭鳴問題，擬定一批題目和指定作者，並確定各文的審稿人和交稿日期。^㉑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將相關指定組織撰寫的文章，譬喻為一批「火箭炮」，^㉒適足反映其欲對「右派」加以痛擊的心理。

鄧小平在運動處於「引蛇出洞」階段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活躍身影，亦可從以下幾方面觀察：

第一、5 月 23 日下午，鄧小平在劉少奇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最近整風「鳴放」情況和針對反「右派」工作部署的報告。^㉓

雖然不知鄧小平報告的具體內容，但從片段的記錄中，可顯現鄧小平對於整風以來中共面臨嚴重抨擊時其個人的心理變化。鄧小平在會議上說：

現在的問題是：這個運動可不可怕？現在我們確實有些擔心，比如我們黨校有相當的高級幹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們在那裡很擔心。這個擔心是有理由的。你說共產黨看到那個罵娘的事情心裡不著急呀，我看也難設想，我就有點著急。開始幾天，人心裡面有點急。後來看到那個反動的東西愈多，心裡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擔心是不是會出亂子。總的估計是出不了亂子。^㉔

鄧小平之所以從原先的擔心、著急到後來的安心、舒服，就是因為其自認找到了問題的核心、鬧事的兇手——就是唯恐天下不亂的「右派」在趁機搗亂、發難。既然「病源」已被診斷確定，剩下的問題就是如何「對症下藥」、「藥到病除」，故能感到寬心。

另外，更重要的是，會議主持人劉少奇在作結論講話時表示：「小平同志的報告很好，這是在主席那裡中央常委確定的，要根據這樣的方針、步驟來領導當前的運動。」^㉕由此可見，在運動重心逐步轉向「反右」之時，運動是毛澤東為首的常委會（鄧小平亦是其中一員）決定方針後，鄧小平及其麾下的中央書記處在執行運動上負責具體部署。之後的發展也顯示，這種工作格局是貫穿整個「反右」過程的。

註 ⑳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中卷，頁 383。

註 ㉑ 薄一波，前引書，頁 637。徐則浩編著，前引書，頁 448。

註 ㉒ 沈志華，前引稿。

註 ㉓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頁 45。

註 ㉔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 696-697。

註 ㉕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 697。

第二，5 月 26 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鄧小平偕同毛澤東等其他常委，聽取中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的匯報。^④隔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鄧小平更代表中共中央在會上作關於整風問題的報告。^④

鄧小平在報告中首先向匯集於一堂的地方大員說明中央當時對於情勢的研判，其中最重要的情況是「右派」的圖謀不軌、蓄意奪權。鄧表示：整風運動開始的目的是搞黨內的三大主義，因為問題很嚴重，最初用的是內外夾攻的辦法。運動開展以後，絕大多數的意見是正確的、有益的，90%對我們有幫助。

但很顯然有部分右派跟我們爭領導權。這個鬥爭不只是在思想領域，已經擴及政治範圍。有人提出綱領很謹慎的，不是打倒共產黨，而是要我們退出陣地。各地都看得出，以上海、北京為典型。因此中央不能不做鬥爭，他們已經（這樣）做了。

在「右派」已有所動作、中央「不能不作鬥爭」的情況下，鄧小平強調：「黨內外歸結起來一個目的，加強黨的領導」。亦即以鞏固中共的統治地位作為號召，動員來自各地的領導幹部，使之同仇敵愾。鄧小平後來更進一步地對「右派」活動的跡象加以介紹。鄧指出，現在「右派大體出來了」，如章伯鈞、章乃器、龍雲等等。右派活動現在有兩個傾向，一是「向基層發展」，二是「暗地組織活動的跡象明顯了」。如此易令在座者產生敵情確不可小覷的印象。

對於運動的方法，鄧小平指出：

關鍵是能不能團結中間派。右派在爭取中間勢力，左派、我們也在爭取中間勢力。我們爭取中間勢力有兩條：一是改正自己的錯誤，二是孤立右派。用右派教育中間派，使中間派知道需要同右派劃清界線。

關於今後的方針，鄧小平表示，還可以繼續鳴放，主要在機關、大專院校，讓右派進一步暴露出來。黨團隊伍也要考慮整頓。但工廠、中小學不要觸動，關鍵是不能「出大亂子」。易言之，鄧小平在鼓勵黨人盡可能地誘出所謂「毒花」、「毒草」的同時，也界定了運動的範圍，因為過早讓工人、中小學的師生投入運動，可能會模糊焦點且衍生不必要的混亂。

最後，鄧小平談到「中央有個設想」，即「運動的下一步我們要建議黨外整風」，「黨內外幾百萬知識分子的改造不能放鬆」，還是採取說理的方法。這預告了整風運動的對象將從現在針對中共本身，逐步向黨外移轉。而在「鳴放」過程中，知識分子的表現顯然讓中共失望，所以不但「改造不能放鬆」，在運動即將發生質的變化以後，他們更是首當其衝。

據毛澤東的重要文膽陳伯達的回憶，鄧小平在會議上還使用頗具刺激性的語言，對於運動後續的發展產生負面的影響。陳表示：

註④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吳殿堯主編，朱德年譜，新編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年），頁 1610。

註④ 以下鄧小平在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內容，皆出自：沈志華，前引稿。不再另外加註說明出處。

他（鄧小平）在那次會上對各地的領導人說：「現在時間比金子還寶貴，你們要趕快回去收集右派們的言論，否則時間晚了，就收集不到了。」我當時很驚訝，怎麼會「時間比金子還寶貴」呢？人總是會說錯話的，這樣抓緊時間去專門收集言論，牽涉的人就多了。所以，反右後來搞得那樣擴大化，鄧小平同志是有很大責任的。^④

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在執行「引蛇出洞」策略時，考量到黨在運動中的整體利益，也是有所選擇的。例如 5 月中旬召開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 3 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此次會議決定將之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亦即「共青團」），會議期間，有一些與會者提出會議的開法也應如同當時各界所採行的熱烈「鳴放」。對於團大會的開法，鄧小平以寫信的方式予以介入，明白反對會中採取「鳴放」，認為此舉在國內、國外都會遭到有心人士的利用。

5 月 31 日，鄧小平在接見團省、市委書記時，曾對此加以更清楚的說明。^⑤鄧小平表示：「要在大會當中鳴放，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呢？肯定的說是錯誤的。你們的大會主席團沒有接受過這個意見，我看是對的。」鄧更強調：對內，「如果你們在大會鳴放，中國青年報（作者按：此為團的機關報）整篇整篇的登，那麼有的報紙是最高興登你們的消息的。」亦即「資敵」，提供那些被所謂「右派」把持的報刊抨擊中共的材料。對外，「法新社、美聯社登這些文章，這樣做對你們共青團並不光彩。」也就是預防西方媒體藉機作文章。

鄧小平在同一場合的其他講話內容，可以看到更多斯時鄧對運動發生情況的回應。而且值得一說的是，鄧小平此次講話雖同樣有上令下達的含義，但由於其談話對象是年紀較輕的團的幹部，言論中更能流露鄧個人的色彩。

對於充斥版面、成篇累牘的批共言論，鄧小平反駁：「現在黨外有些人攻擊我們，罵我們是『特殊階級』。新階級是沒有的，生產資料並沒有歸我們私有」。鄧指出運動的確暴露出中共自身的問題，「告訴我們值不得驕傲」、「腦筋不能發脹」；但仍自信地強調「我們的黨」「總的路線、總的政策基本上是符合群眾利益的」，「現在要群眾趕共產黨下臺他是不幹的」。正自認為民心所向，對於此時由中共刻意誘發而成的「敵狂我狷」態勢，鄧小平自然是老神在在以對：「不要看到報紙搞得那麼凶，但是最後還是無產階級勝利，還是無產階級凶。」

對於值此在北京大學校園內獨領風騷、儼然有舌戰諸儒之勢的學生林希翎，鄧小平也有一番反向思考的獨特評論。鄧認為基層黨組織辯駁不過林希翎，顯出此前政治思想教育的缺點與不足。鄧就表示：「林希翎是個好教員，她首先教育了一些人知道自己不行，本事不大，使得我們要臥薪嚐膽，刻苦自勵。」

此外，在「引蛇出洞」的後期階段，作為運動的具體組織者的鄧小平，並非僅是坐鎮於首都北京指揮。6 月初（應是 5 日左右），鄧小平赴東北視察。6 月 7 日，鄧小

註④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 年），頁 149-150。

註⑤ 鄧小平在此次接見的講話內容，出自：「鄧小平同共青團省、市委書記的談話（1957 年 5 月 31 日）」，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鄧兵團編印，前引書，頁 30-36。以下不再另外加註說明出處。

平在遼寧、黑龍江、吉林 3 省黨員負責幹部會上講話。^⑦雖然沒有資料說明，然而，在準備「反右」的緊鑼密鼓之際，鄧小平對東北 3 省要員的談話中，強調蓄積力量、加緊對「右派」反擊的準備工作，必是題中應有之意。

二、發動反右（6 月初~7 月中）

6 月 8 日，中共正式發動「反右派」鬥爭。其標誌有二：一是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起草的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其指出，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他們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⑧一是由毛澤東起草、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要求各省市級機關、高等學校和各級黨報都要積極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⑨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開始在全國範圍展開。

發動「反右」的時間點，無疑主要是毛澤東所決定，然作為領導核心一分子的鄧小平也參與了此一決策。7 日，人還在東北視察、演講的鄧小平，8 日下午，即返回北京參加毛澤東召集的會議。^⑩鄧小平行色匆匆，可見會議的重要性，勢必關乎發動「反右」的重要決定。「反右」號角聲響後，先前由鄧小平主持佈置的所謂「火箭炮」，接連打響。自 6 月 9 日起，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表明官方立場並對先前異議之聲展開回擊。這些社論的發出對於扭轉輿論方向有重大的影響，利於中共重新佔領發言的制高點。

鄧小平在中共正式開始「反右」的這一階段，扮演的是運動督導人和直接執行者的角色。

第一、在「反右」初期，鄧小平到地方指導整風、「反右」工作。

例如：6 月 14 日，鄧小平在廣州向省委傳達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指示並指導廣東工作。^⑪據當時任職廣東的趙紫陽晚年的回憶：「鄧小平到廣東來做報告，說放長線釣大魚」。^⑫亦即鄧小平向粵地領導人打招呼要繼續鼓勵「鳴放」以引出仍未曝光的更大的異己分子。鄧小平到地方傳達中央對運動的新方針、代表中央出面鼓動其行經地區的運動氛圍，鄧也擔負觀察地方運動發展情況，以讓中央及時掌握的任務。6 月 17 日晚，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即首在聽取鄧小平關於幾個地區開展「鳴放」情況的報告。^⑬

鄧小平到地方巡視，並不僅止於此。6 月 22 日，鄧小平又到山東視察，在省級機

註 ⑦ 鍾瀨編著，鄧小平的理論與實踐縱覽（1938-1965 年）（北京：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301。

註 ⑧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中卷，頁 386。

註 ⑨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 51。

註 ⑩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 50。

註 ⑪ 當代廣東研究會編，嶺南紀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08。

註 ⑫ 「叩訪富強胡同六號」，博訊新聞網，<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5/01/200501301027.shtml>。

註 ⑬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 53。

關黨員幹部大會上作關於整風、「反右」運動問題的報告。⁵⁴其後，鄧小平則藉由召開「電話會議」的方式，與地方省委書記保持運動相關訊息的暢通。⁵⁵

第二、鄧小平以找高、中級負責幹部開會和講話的方式，闡釋政策、驅策動員，指揮運動前進。

鄧小平一方面利用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時，讓重要黨幹列席會議，使之聆聽新的運動指示後，再各自回到所屬部門推進運動。例如：7 月 4 日上午，中央書記處召集一會議，由鄧小平作整風、「反右派」鬥爭的報告。與會的人士中包括「中國作家協會」的黨組書記邵荃麟、劉白羽。當日下午，邵、劉就在「作協」的黨組會中「傳達了小平的報告。一起商談了一下方針和步驟。」⁵⁶

另一方面，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出席公開的會議，作關於運動的綜合性報告。鄧小平在 7 月 12 日出席統戰工作會議的講話，可說是一代表。此也是目前所能找到鄧小平在這一階段對運動所曾做過最完整的一次表述，對於理解、認識報告人鄧小平當時對運動的看法、採取的作為有很重要的意義。⁵⁷

首先，鄧小平對 5 月中旬「引蛇出洞」以來運動的成績予以肯定的評價。鄧指出，中央抓住、抓對了找「右派」此一主要問題，「確實抓到了大魚」，在政治方面「已經收到顯著的成績」。並高調宣稱毛澤東所倡「雙百方針」的正確性，認為其優於蘇聯的「一家獨鳴」外，也能讓「牛鬼蛇神都現出來」，從而「教育民衆、爭取中間，暴露右派，也鍛鍊了黨」。

其次，對於運動接下來的要求，鄧小平強調主要是「思想方面的收穫」，「運動的實質是毛主席所說的『滅資興無』的鬥爭，就是要滅資產階級思想，興無產階級思想。」由於思想鬥爭短期內無法取勝，「打這種仗，不能急躁」。鑑於鬥爭不能求速決、速成的特性，鄧指示「對右派打得要狠，不能溫情主義」，「狠就是用充分論點和事實根據駁得他體無完膚，這才是狠。」「打他兩下子不是狠，是粗暴」，也就是在思想上對「右派」要做無一疏漏的地毯式駁斥，使之思想徹底「破產」。

再次，對於運動的操作，鄧小平提出了具體的指示。包括：1.「要把隊排好」，也就是在運動中辨別我、友、敵與左、中、右。鄧明言其方法是「鬥爭深入，暴露多，排隊就容易」。2.點名批判。鄧批評「前一時期報紙上點名點得太少，出現老一套，就那麼幾個人，那一些東西。」鄧更針對上海指出其點名太少，要增加一倍。就全國的範圍，可被點名者「不僅是民主黨派，其他方面也可以點，如新聞界、文藝界、戲劇

註 54 山東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山東省志（大事紀）*，中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730。

註 55 例如：1957 年 7 月 8 日，鄧小平即曾召集全國地方省委書記進行電話會議。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p. 283.

註 56 李向東、王增如，*丁陳反黨集團冤案始末*（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194。郭小川著，郭曉惠、郭小林整理，*郭小川 1957 年日記*（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39。

註 57 鄧小平在此一會議的講話內容，出自：「鄧小平同志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反右文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特殊館藏，頁 23~29。以下不再另外加註說明出處。

界」，「只要不超過 800 人就沒有危險。」若按照 7 月 2 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所稱，估計全國右派有 8000 人。^{⑤⑧}亦即可允許 10% 的右派在報上受批判。^{⑤⑨} 3. 推廣地方的「有效」經驗。鄧表示「現在有幾個經驗，大魚在後面才能出來，在運動深入時才能捉出來，分化後才能揭出來。」事實上，鄧演講的前 5 天，中共中央才轉發了《吉林省委關於高校鬥爭的情況報告》。報告中表示：先前在第一線公開向我們進攻的右派分子，主要是一批「蝦兵蟹將」，更凶惡的「鯊魚」多在暗地活動。^{⑥⑩}可見鄧對「吉林經驗」的重視。上述鄧小平對運動做法的指示：運動要再深挖、要加大對「右派」的輿論轟炸，以及真正的「大魚」還未出來的估計。經由散播，無一不會對運動的發展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

再其次，對於若干已「落網」成為「右派」象徵的著名高級民主人士的鬥法，鄧小平也提出詳細的指示。例如：鄧表示：「章羅聯盟（作者按：章伯鈞與羅隆基）就是想推翻我們，把我們搞倒，他來上台」，但是「章羅再弄也就沒意思了，就那麼多東西，重複人家就不高興看了」。相形於錢偉長「其言論還有市場」，可以考慮再開萬人大會批判，「章羅就不必了，因為他們已經臭了」。然而，鄧小平並不贊成有人建議的馬上撤掉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等職務，鄧認為當前對之暫不動是有教育意義的，因為「撤掉就沒有戲唱了。對中間分子的教育爭取就差了，中間分子就想息事寧人，一撤事情就完了，他就好去睡覺了，這是代表中間分子思想的」。

鄧小平說「章羅是合作社」，龍雲則「看來是個單幹戶」，其送來的檢討書，「也還深刻，但背後還是罵娘。罵就讓他罵吧，不讓把罵也不行。」鄧指出「對低頭繳械的適可而止」，「龍雲就差不多了，以後有材料還可以再弄」。鄧小平主政西南時親自安排龍雲出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先前是虛位以懸的爭取對象，僅數載耳，此時已形同陌路。對於費孝通，鄧小平指示對費「就可以分化出來」，「要爭取過來，他會寫文章，他的文章對爭取教育中間有意義」。如此證明對這些「右派」中的「首犯」的鬥爭，是緊控在鄧小平手裏的。

第三、鄧小平直接過問各單位、部門的整風「反右」運動，施予個別指導。

例如：對於中央高級黨校，在毛澤東表示對黨校學員的思想動態不滿之後，6 月 19 日，鄧小平領導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就專門針對中央高級黨校的問題開會討論，決定全校學員都留校繼續整風，所有課程都停下來，原定的大報告一律取消，採取群眾路

註 ⑤⑧ 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講話，1957 年 7 月 2 日。沈志華，前引稿。

註 ⑤⑨ 鄧小平在「反右」開始僅 1 個月的時間，下令報紙擴大點名批判「右派」的作法，乃是為了保持、甚至增強此一政治運動的動力。因為報紙輿論上增加對「右派」人數的批判，一方面，可讓中共各級幹部感到「右派」份子數目不單是個別、零星，顯示相關敵情頗為嚴重，對之要提高警覺、不能小覷；另一方面，報上批判的方式與揭露的內容，也可作為中共各級幹部參考、仿效的對象和依據，亦即按照報紙來領導運動，進而在其所轄單位內進行對「右派」的挖掘與追緝。這對於「反右」運動的進一步開展，無疑有推進的作用。

註 ⑥⑩ 張國星，「關於右派的人數和性質」，黨史博覽（鄭州），第 6 期（2005 年），頁 50。

線的辦法，開展大討論，不解決問題不能回去。^①

對於知識文藝界，鄧小平特別與聞群聚中國大陸當時著名文人、作家的「中國作家協會」。「作協」主辦的《文藝報》，在先前政治較為寬鬆的日子裏曾刊載不少的大膽、甚至是「出格」的言論。鄧小平要中央宣傳部主管「作協」事務的副部長周揚，轉告《文藝報》主編張光年：「要張光年把腦殼後面的一些小辮子自己揪下來，積極投入反右鬥爭，把《文藝報》辦成文藝界反右的主要陣地。」^②張光年與《文藝報》於 6 月 24 日到 7 月 8 日召開了全體工作人員大會進行自我批評，雖躲過了一劫。^③但出於自保與對鄧「打招呼」的回報，張光年「拋出」該報副主編蕭乾，作為替罪羔羊。

另外，在「肅反」運動的背景下，1955 年在「作協」內部中被揭出的「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一事，^④因丁、陳本人的不服，一直爭休不斷。1956 年，中宣部獲得鄧小平的同意後，開始對相關人士進行複查。^⑤但有關的調查結論仍未為丁、陳所接受。

在 1957 年整風氣氛下，丁玲與陳企霞要求重議，在「作協」內引發熱烈的討論，進而對當初主其事的領導周揚提出質疑與批評。6 月，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對鄧小平與中央書記處報告關於丁、陳的爭論。鄧小平對於陸定一對該案的相關面報，起先仍是採取較開放的態度。據與陸一起出席、時任中宣部秘書長的李之璉回憶，主持會議的鄧小平，「沒有表示什麼意見，只是說：意見不一致，你們去討論。」^⑥

然而，當陸定一與周揚決定利用「反右」，將丁、陳翻案與對領導提意見看作是向黨進攻的「歪風的代表」後，鄧小平改變不介入此案的態度。7 月 3 日下午，周揚召集「作協」黨組領導開會，傳達鄧小平的意見，「他（鄧）認為現在對右派勇氣不夠，方法不夠。時間要延長，鬥爭要堅決展開。要各單位排排隊，做出計劃來。」^⑦周「如獲至寶」地旋即按照中央的安排，決定在「作協」內對丁玲等人開展「反右派」鬥爭。

此外，鄧小平詢問其他部門的運動狀況的情形，可另見：6 月 19 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在對中央高級黨校的運動做出指示時，也討論衛生部的整風問題。6 月 28 日，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外貿部等單位整風情況的匯報。^⑧鄧小平更曾在 7 月 12 日公開點名化工部副部長是「右派」。可以想見，鄧小平對各單位運動進展的了解，縱使不能鉅細靡遺，也可達致通盤性的掌握。

註① 杜光，「中央高級黨校反右派內幕」，炎黃春秋（北京），第 9 期（2005 年），頁 3。

註② 李輝，「與張光年談周揚」，學術中國網，<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4029>。

註③ 黎之，「回憶與思考—整風、鳴放、反右」，新文學史料（北京），第 1 期（1995 年），頁 100。

註④ 此事乃涉及丁玲與周揚多年的個人恩怨，以及周揚欲藉打擊在「作協」內頗孚人望的丁玲，以掌控「作協」的權力考量。陳徒手，人有病天之否：1949 後中國文壇紀實（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15~117。

註⑤ 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修訂版（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 年），頁 382。

註⑥ 李輝，「與李之璉談周揚」，學術中國網，<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4031>。

註⑦ 郭小川，前引書，頁 138。

註⑧ 徐則浩編著，前引書，頁 449。

在運動進入開始「反右」的階段後，鄧小平曾在 7 月 4 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和 7 月 12 日的統戰工作會議上，強調整風與「反右」不可偏廢，黨自身改進工作的成功與否，既有杜絕「右」、拉攏「中」的效果，更直是維繫、增進群眾對黨之向心力的根本之道。^⑩但是鄧小平「兩手都要抓」的勸說，收效必然不彰。因為在經由整風暴露敵人而展開追擊的「反右派」，以及經由整風揭發弊病而促發改進黨的工作之間，不同於抓「右派」時迅速可見的鬥爭結果和成績，改進工作需時較長，相較難收「立竿見影」之效。再加上「反右」運動的浩浩蕩蕩、大張旗鼓，更吸走各級黨幹的注意力，「迎敵痛擊」求戰的喜悅與熟悉，自非虛心檢討、默默耕耘的工作經營可比擬。因此，鄧小平對黨幹不要放鬆整風的提醒和呼籲，其作用如同「曲高和寡」。事實上，鄧小平自己對於「反右」的投入興致和專注，更不亞於「磨刀霍霍」的其他黨人。

三、反右持續加溫（7 月下旬以後）

（一）青島會議

7 月 17 日至 21 日，中共中央在青島召開省市書記會議，著重討論了反右鬥爭問題。鄧小平也出席了會議。期間，毛澤東所寫的 1957 年夏季的形勢一文，強調：「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各界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各階層，「都應當進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⑪該文作為指導運動的新方針，對於運動後續的發展，產生加溫與擴大的作用。

根據毛澤東「1957 年夏季的形勢」的最高指示與思路，鄧小平在 7 月 23 日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對運動進行具體安排和部署：明確右派問題是「敵我性質」；強調「運動要展開，每單位各行各業要展開，農村、工廠也要搞，方法不同」；分別起草有關農村整風和工廠整風的指示；地、縣一級整風，首先批判右派，然後轉入以思想教育為主的整風。

對於如何處置「右派」的問題，鄧小平表示「組織處理不忙，人大、政協、黨團都不忙處理，等人大改選後再說」，但要求「要積極做準備工作」，並指定「統戰、宣傳、組織部趕快研究，12 月必須拿出方案。政協、人大，包括省市，11 月拿出方案，統戰部負責。」^⑫鄧小平對與運動直接相關的中央部門、政府系統以至於地方的運動進度，做出具體時間的規定，其身為運動執行者的關鍵角色，再次表露無疑。

註⑩ 「北京市委 7 月 5 日鄭天翔傳達鄧小平整風報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鄧小平反動言論（北京：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資料組編印，1967 年），頁 20。「鄧小平同志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反右文件，頁 24、25。

註⑪ 毛澤東，「1957 年夏季的形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6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543~544。

註⑫ 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第 38 次）紀錄，1957 年 7 月 23 日。沈志華，前引稿。

（二）黨內反「溫情主義」

在運動朝向基層、廠社發展時，在中共黨內運動的發展，也明顯的升溫。中共發動整風運動，本意就是要對黨自身的革新。自整風「鳴放」以來，言行出現脫序、失常的黨員，勢要受到嚴厲的懲處；其舉止若被判為與「右派」無異，更是要成為被清洗出黨的對象。鄧小平在黨內「反右」上的表現，給人的觀感是相當地「鐵腕」，有「大義滅親」、在所不惜之感。

鄧小平對於黨幹黨員在運動中是否站穩立場，不但一直很密切地關注，態度也甚為嚴厲。在運動處於整風、以至步入「引蛇出洞」的階段，鄧小平就表示「確實有一些並不具備入黨、入團條件的人入了黨、入了團」。因為鄧就特別注意到「北大先貼大字報反共的就是一個黨員、兩個團員，這就是投入到資產階級隊伍裏去的人。」^⑦正式發動「反右」後，鄧小平即強調「黨團員是右派應該一視同仁，當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不要包庇，沒有什麼可惜。」^⑧7月青島會議後，中共黨內加緊展開反「溫情主義」，鄧小平確能做到「鐵面無私」。以下即以前面曾提及的中央高級黨校和「中國作家協會」為例，觀察隨著黨內「反右」持續加溫，鄧小平愈大的介入力道，是如何對此二單位運動的激化產生巨大的推力。

1. 中央高級黨校方面。7月22日，該校正、副校長兼黨委第一、第二書記的楊獻珍、侯維煜，向中央書記處上報4人名單，其中兩人被劃為右派，兩人被指稱有右傾錯誤思想。報告上送後，鄧小平召見楊、侯。在談到被指稱有右傾錯誤思想、進黨校學習前為全國總工會海員工會國際部部長蕭魯時，鄧小平說：「一個黨員領導幹部，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倒過去了，那怎麼行？」「你們高級黨校學員中絕不會只有兩個右派分子，反右剛開始，你們思想不要右傾啊！」鄧的語意很明顯：中央高級黨校內一定還有沒現身的「右派」，只待校領導努力去追、致力去抓，對此若躊躇不前，就有犯「右傾」錯誤之虞。

在鄧總書記當面指示後，楊獻珍等只能進一步地高級黨校內「反右」，在8月17日，在學員中確定劃了9名「右派分子」。顯然，鄧小平對此還不甚滿意。8月23日，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國家機關黨委、全國總工會和高級黨校3個單位的整風反右問題時，鄧小平對應召列席楊、侯感到不耐煩地說：「蕭魯的問題，你們第一次上報他的材料時，中央就批准把他劃為右派，你們怎麼現在還在猶豫？」「如果這樣的人不劃為右派，黨內就沒有什麼右派了。」「這樣的人不搞出去，他就不知道怎樣才像一個共產黨員。」在書記處內作為鄧副手的彭真，更插話表示：「現在的問題不是蕭魯是不是右派，而是你們兩個是不是中右的問題。」毫無疑問，鄧、彭的施壓，對中央高級黨校的運動有直接加乘的作用，到了12月初，黨校教職員不算在內，學員

註⑦ 「鄧小平同共青团省、市委書記的談話（1957年5月31日）」，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鄧兵團編印，前引書，頁34。

註⑧ 「鄧小平同志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反右文件，頁29。

中就有 63 名被劃為「右派」。^④

2. 中國作家協會方面。中宣部正、副部長陸定一和周揚，決心利用「反右」之機，將欲為自身洗冤的丁玲、陳企霞當作文藝界「反右」的「成績」上呈中央。對此，鄧小平不但樂觀其成，更希望能儘早交出成果。例如：7 月 26 日，中央書記處就批評文藝界「搞得太慢」。在中央聲聲催的情況下，周揚與「作協」黨組領導在費盡一番心力後，總算是「攻破」了丁、陳為首的「反黨集團」的「猖狂進攻」。8 月初，陸定一請示鄧小平有關後續登報告捷的事宜。鄧小平或覺得此既是「反右」佳績，自應早早面世昭告，故鄧主張兩天後馬上登報。鄧小平這種喜聞樂見運動「捷報」的心理，倒是苦煞了相關的承辦人。^⑤此即 8 月 7 日，人民日報頭版刊載的「文藝界反右派鬥爭的重大進展—攻破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一文的由來。

鄧小平對「作協」內的「反右」攻勢，愈益催促。8 月 9 日晚，鄧小平與周恩來「召集文藝界同志談了反右派鬥爭問題」。鄧、周指出：

文藝界反右已展開，但火力還不夠，應該更徹底。不要有溫情主義，不要認為搞得過火了、面寬了等等。個人主義在文藝方面很厲害，略有成就就反黨，根本忘記他的成就是怎麼來的。今天不痛，將來不知道要怎麼痛，將來就痛得不可收拾。頑抗的只好毀掉，淘汰一部份，這也是挽救更多人的好辦法。這些人就是文藝界的敗類，如不淘汰就起腐蝕作用。如這些人不整，則搞出的東西也是資產階級的。不要姑息名演員、名導演，給他再次登報，揚揚臭名。^⑥

對於「作協」的鬥爭，鄧小平、周恩來也做出具體的指示。兩人咸認為「鬥爭已展開，很多大鯊魚浮上來了」，並決定緊接著就展開對馮雪峰的鬥爭，掃清外圍，再進一步揭露「丁玲及其小集團」。^⑦馮雪峰是中共當年尚蝸居於贛南時即有一定名望的資深黨員，在鄧小平督陣的反「溫情主義」的浪潮下，也中箭落馬，成了「丁陳集團參加者，胡風思想同路人」、「文藝界反黨分子」、「右派骨幹分子」。

在「作協」內的「反右」鬥爭塵埃已定的情況下，9 月 3 日，鄧小平曾對此予以評論，也可從一個側面觀察鄧是如何解釋何以一些「老資格」的黨員「昨是而今非」的問題：

丁玲問題在前年也認識不夠，一定要再加兩年，還得有個反覆，是否把問題搞過了？這樣才把問題最後搞清楚，有些人過去認為是好幹部，這次是個右派，是否過去都看錯了？不是的。事和物都有隱蔽的一面，沒有一定的溫度、一定的時間、一定的場合是露不出來的，沒有什麼值得後悔的。現在暴露出來了一些問題，這是好事還是壞事？應該說，這是好事。把問題通通發現出來，這很好，如果不發現，再讓這些右派搞 3 年，情況就不同了。現在發現了，是好事。^⑧

註④ 杜光，前引文，頁 5~8。

註⑤ 郭小川，前引書，頁 155、161。

註⑥ 李向東、王增如，前引書，頁 223。

註⑦ 郭小川，前引書，頁 166。

註⑧ 「鄧小平對共青團省、市委書記會議的黑指示（1957 年 9 月 3 日）」，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鄧兵團編印，前引書，頁 37。

鄧小平在強力執行黨內「反右」上，也發生一件為其始料不及的事。對於在他人貼的大字報上寫歡迎批評、鼓勵向領導大膽提意見的時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長、總編輯的曾彥修，據聞在當時中共黨內傳達的一個講話中，鄧小平指責「帶頭作亂」的曾彥修為「中國的納吉」。⁷⁹想不到 10 年以後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物換星移，鄧小平同樣被指稱為「鄧納吉」。

（三）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的專題報告

9 月 20 日至 10 月 9 日，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三中全會。依照中共黨內由工作負責人作報告的習慣，9 月 23 日，鄧小平在全會上作《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

鄧小平此篇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稿，毛澤東在 9 月 20 日審閱時批示：「此件很好」，僅有「若干小的修改」。⁸⁰由此可以顯示，鄧小平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其內容觀點乃為毛澤東所讚賞、同意。雖然該報告的主張並非全然是鄧小平一人的發明創見，而是綜合、統整以毛為首的黨中央在相關問題上的「集體智慧的結晶」。但如此確可反映出，鄧小平在整風、「反右」問題上，不但是與毛和其他領導人保持高度的一致，更能在自我吸收咀嚼後，將之系統化、條理化，成為為毛認可的代表中共中央當下「反右」情勢評估之權威論斷，以及黨對運動在各個領域（包括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農村、工人階級、少數民族、軍隊、黨和團）之後的行動依據與指南。

由於以前對鄧小平的相關研究，在說明鄧對「反右」問題之態度和立場上，多以此文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依據。故其內容在此不加贅述，僅提兩點：⁸¹ 1. 鄧表示運動要愈加鋪展，要「擴大成為全民的整風運動」；雖然「鬥爭一般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但仍強調「當前的任務是把反右派鬥爭進行到底」。在「宜將剩勇追窮寇」的號召下，運動方興未艾直到 1958 年春方結束。戰線拉長，落網者更是幾倍翻增。⁸² 2. 知識分子問題方面，鄧首先指出，因為多數知識分子因係資產階級的出身與教育，「為了方便起見」，將之「同資產階級放在一起說」。這種將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並論的「便宜行事」的提法，有不少知識分子聞之反應負面：「感到突然」、「想不通」，懷疑「這樣是否就一樣看待了」；⁸³ 鄧接續直指：「這次反右派鬥爭，主要是在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

註 79 一位中國大陸資深的學者提供的資訊。

註 80 毛澤東，「對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稿的批語和修改」，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6 冊，頁 584。

註 81 鄧小平相關報告的內容，出自：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人民日報**（北京），1957 年 10 月 19 日，第 1 版。以下不再另外加註說明出處。

註 82 薄一波回憶：1957 年 9 月八屆三中全會時，全國已劃「右派」62000 多人，當時會上透「底」估計，全國約有「右派」分子 15 萬人。然而，到整個運動結束，全國共劃「右派」分子 55 萬人。較原先估計的多達 40 萬。薄一波，前引書，頁 642。

註 83 「濟南市幹部、群眾對鄧小平同志報告的反應」，**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北京），總第 2344 期（1957 年 10 月 28 日），頁 4。「天津各界人士對鄧小平同志報告的反應」，**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北京），總第 2343 期（1957 年 10 月 26 日），頁 7。

範圍內進行」、「右派分子活動的主要場所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並警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造自己」，「否則就有變成上不沾天下不著地的『樑上君子』的危險。」其後，中國大陸知識分子長期的抑鬱不得志，作為當年運動鋒將的鄧小平，自難辭其咎。

鄧小平此一《報告》，在 1957 年 10 月 19 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事實上，該文也是鄧小平在運動中唯一公開署名的文字。從後來的反應來看，對於運動而言，鄧小平這篇「宏文大作」，算得上是成功，因為其確實達到了激勵同志、渙散敵人的效果。例如：運動積極分子迴響甚為良好，覺得「整個是很精彩的」。⁸⁴「右派分子」中有的哭喪地表示：「這回可完了，要開除黨籍了」，有的「感到罪惡嚴重」、「思想壓力很大」。⁸⁵不過，這篇在運動中起到「振聾發聵」的文章，不知是否認為已不合時宜，鄧小平晚年並沒有將之收入自認是其「政治交代」的鄧小平文選中。

（四）對右派的劃定與處理

鄧小平在運動中一個重要的角色，就是在劃定「右派」和對之處理上所具有的巨大權限。

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對於劃定「右派」問題，手握「生殺大權」，能夠審定下級機關報送請求批准的相關「戰果」，除非是毛澤東直接關注的對象（其多半是著名人士，為數不多），作為書記處之首的鄧小平，具體而微到特定的部門與人士時，通常即可一錘定音。例如：與毛澤東認識多年的丁玲、馮雪峰，其之「入罪」，恐非得毛首肯不可；但是以丁玲為首的「集團」，其成員人數的多寡，鄧小平則可拍板決定。⁸⁶由於毛、鄧關注面寬窄的不同，甚至可以說，在運動中由鄧小平圈定認可「右派」的範圍與人數，比毛澤東還廣、還多。⁸⁷

從「共青團」所屬中國青年報劃「右派」問題上，更可見鄧小平「一言九鼎」的權威。中國青年報在運動鼓勵「鳴放」階段，在社長兼總編輯張黎群的身體力行下，提出不少前衛、甚至挑戰性的觀點。「反右」開始後，該報一下淪為所謂的運動「重災區」，張黎群更成為團內運動積極分子的眾矢之的。

由於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替張黎群說項，再加上，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在向中

註⁸⁴ 郭小川，前引書，頁 213~214。

註⁸⁵ 同註⁸⁴。

註⁸⁶ 據作家李納回憶：「在右派鬥爭進行尾聲時，劉白羽又找我談話說，鄧小平同志講了，丁陳反黨集團只劃 7 個人，不能再擴大化了，要不然，你們幾個人（同丁玲關係較密切的人）都得劃為右派。」李向東、王增如，前引書，頁 245~246。

註⁸⁷ 例如：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黃克誠，其在 1980 年表示：「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但是擴大化了，錯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個負責。我那時是書記處成員之一，把有些人劃為右派，討論時未加仔細考慮就倉促通過了。自己做錯的事情怎麼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由此可見領導中央書記處的鄧小平在運動中的重大權限。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369。

央書記處匯報時也著意為之緩頰，鄧小平在議處張時表示：「這是個糊塗人，總編輯就不要當了。」^⑧最後，張黎群雖受黨內嚴重警告、撤銷團中央常委職務之處分，但畢竟倖免被打成「右派」。「共青團」內運動的積極分子對於《中國青年報》不願鬆手、硬要喊打，在鄧小平做出「對於《中國青年報》，大家有些意見是對的，但是要說清楚，報紙沒有照右派、照資產階級方向去辦」的表態後，^⑨即告平息。否則，運動在團內傷及的人數只會更多。

從鄧小平手中「虎口餘生」幸運者，張黎群自應不是唯一的案例；但是經鄧親自認可、裁定而叫屈、抱憾墜入右派「深淵」者（如：中央高級黨校報送的蕭魯），更必然遠不在少數。

「右派」被識破、揪出以後，後續的就是如何將之懲治安排的問題。對於「右派」的處理，鄧小平也有重要的發言權。首先，作為運動的首要執行者，鄧小平做出統一的部署。前有提及在7月青島會議結束後，鄧小平就指示相關各部要在規定時間提出處理「右派」方案。其次，鄧小平自己也提出相關的構想。例如：有論者指出，遣送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右派」到農村進行勞動，正是出自鄧小平的倡議，並為毛澤東所採納。^⑩對於學生中的「右派」，鄧小平提出的處置辦法，甚至比毛澤東還嚴苛。鄧主張全部開除學籍，毛倒認為可留下一些在校園內做「反面教員」。^⑪再次，鄧小平有時也直接介入一些單位對「右派」的處理。中宣部主導下「中國作協」在運動中的成果—「丁陳集團」，其相關人員的處理，即是周揚請示鄧小平後才予以安排的。

^⑫

「右派」份子被劃定並作組織處理後，多被迫調離原職，甚至遠走他地，不但要承受勞動改造對生理上的強力負荷，也必須忍受淪為政治異類後心理上得面對的壓抑與疏離。「右派」的這種負面政治標籤，更使「右派」自身、甚至連帶其親友，在後來諸多的政治運動中，往往被當作首波被拋出來檢驗、批判的標靶，這在「文革」中更是達到極致。^⑬

伍、結 論

從前述正文的討論，可以對鄧小平在中共整風、「反右派」過程中重要而突出的地位和責任，做一整理和總結。首先，鄧小平在運動中是處於「毛之下，他人之上」的

註^⑧ 滿妹，*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頁154-155。

註^⑨ 「鄧小平對共青團省、市委書記會議的黑指示（1957年9月3日）」，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鄧兵團編印，前引文，頁38。

註^⑩ Lucian W. Pye, "An Introductory Profile: 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5 (September 1993), pp. 431, 438.

註^⑪ 阮銘提供的訊息。（2006年11月22日）

註^⑫ 郭小川，前引書，頁217。

註^⑬ 作者感謝匿名審稿人對「右派」份子的悲慘遭遇，在「文革」中更是嚴重加劇的提示。

地位和分量。無庸置疑地，整風的醞釀、形態、發起，到「反右」的發動與發展，都是由毛澤東親自掌控。運動過程中諸多中共中央發出的指示與文件，也多是由毛自己起草，其對運動之主導性，自不在話下。鄧小平是中共中央常委，其與常委排名在其之前的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朱德，對毛主導的相關決策，同有涉入外，鄧小平較諸劉、周等人對於運動發展，乃發揮更大、更實質的影響力。

因為整風本在整黨，鄧小平身任黨中央總書記，本以料理黨務為主要職責，對於黨自身的除弊與建設，自是責無旁貸；轉入「反右」，鄧小平領導中央書記處，一方面銜命於以毛為首的中央，調動黨機器（中央部門與地方黨委）對黨外「右派」施以回擊、開展全民整風，另一方面，也不放鬆黨內整風，對黨內的「右派」力求除惡務盡。鄧小平與運動的關係，可言是在毛澤東「單線領導」下的「專案負責」，從文中可見鄧小平在運動期間相當地活躍：開大會鼓動動員、開小會發布指示、聽匯報插手過問，奔波各地作報告。相形之下，其他常委起到的至多是在旁建言，或是當涉及其分管業務時方有所表示的作用。⁹⁴

不可忽視的是，鄧小平對運動的統籌執行：上有指令，鄧結合具體情況加以下達；下有新情，鄧過濾盤整再予上傳。在「上令下達」與「下情上傳」之間，鄧小平個人確能享有不小的仲裁空間。毛與中央對運動縱有「雄才偉略」，沒有鄧小平從中的佈置落實，難免有所走樣；置身運動、對之動向最為嫻熟的鄧小平，若無據實以告、適時反饋，毛與中央要善行領導，恐也不無問題。鄧小平在運動中的表現，特別是出令到行止、風行草偃的組織長才，甚為毛澤東所欣賞與滿意。

毛澤東在運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後，於同年 11 月前往蘇聯訪問，毛不但指定鄧小平隨同前去，其在訪蘇期間，在俄共領導人赫魯雪夫面前點評中共自身高層人士時，也唯獨對鄧讚譽有加。從時間的相近，可見經由 1957 年整風、「反右派」的考驗，鄧小平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益加鞏固。不久周恩來、陳雲等國務院主要負責人即因「反冒進」問題遭毛嚴斥、「打入冷宮」，毛澤東要鄧小平在 1958 年發起的浩浩蕩蕩的「大躍進」中扮演要角，也並非是一偶然。

其次，鄧小平對於「反右派」鬥爭激化負有直接干係與重大責任。如前所言，鄧小平在運動中是毛澤東之下的第二號人物，「反右」擴大化，鄧小平的責任當然也僅次於毛。就運動的指導思想而言，整風、「反右派」的決定者是毛，或可以說按照服從上級的組織原則和紀律，鄧自我倡議的空間較小（姑且不論鄧在相關問題上可能與毛是「英雄所見略同」）；就運動的實際領導而言，鄧小平管得具體、問得詳細（毛關注的主要是運動大方向以及若干頭面人物的動態），個人的作用大得多，對運動的推進、甚而擴大別有獨到的「貢獻」。

在運動的過程中，鄧小平往往是替運動「打氣加油」、「催油加速」居多。揮兵「反右」上，常見鄧小平態度亢進、言語激越，例如：「引蛇出洞」期間，指出「時間比黃金還寶貴」，要各省要人趕緊回省內收集「離經叛道」的言論以利「秋後算帳」；

註 94 兩位中國大陸的中共黨史研究學者提供的意見。

展開「反右」後，不厭其煩地強調「放長線釣大魚」、「大魚在後面才能出來」，要運動再深入。以鄧在運動中「二把手」的地位，其每以代表中央所做的相關言行，確可對運動造成推波助瀾的效果。

持平而論，鄧小平也非完全失去理智。例如：在「反右」開始 1 個月後，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即曾談到注意運動擴大化的問題，要求給各地打招呼。^⑤然而，鄧縱使做出「煞車」指示，也模稜兩可。其在書記處會議隔日的更大範圍講話中雖表示：「前一時期右派排得太少了，現在要防太多，太多不好，太少也不好。」^⑥然何謂太多、太少？沒有清楚的界定。這反映鄧小平欲引導運動但又不願潑其冷水、使之降溫的矛盾心理。更何況，隨著運動朝激化的方向發展，還是「多多益善」為好，不然就鄧後來與聞中央高級黨校的例子，單位領導人若太保守，猶有被批評思想上右傾的風險。另外，鄧小平在提出避免運動擴大化的同時，並沒有提出任何違反此一主張的懲處辦法，易言之，一項沒有制裁規定配套的要求，在政治運動「寧左勿右」的慣性下，實質上僅是一不甚認真的勸說。

應予指出的，鄧小平確曾在運動的局部方面，做出實際的保護性作為，例如：鄧小平在審閱周恩來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有關科學界反右派鬥爭的文件時，針對自然科學界方面加寫：「特別是對於那些有重大成就的科學家和技術工作人員，除個別情節嚴重非鬥不可者外，一律採取堅決保護過關的方針。」^⑦鄧小平也同意國務院專家局局長齊燕銘的建議，不在歸國留學生中劃右派，並向全國發通知。^⑧對於醫學專家，鄧小平亦曾有伸以援手。^⑨然這「熱中有冷」僅限於學有專精的特定人士，而且僅係運動已釀就巨大衝擊下所做的部分的緩衝。

此外，中共「反右派」擴大化的一個原因，在於中共中央一直沒有給一個劃分「右派」的明確標準。^⑩運動期間，幹部即有反映此一方面的需求。除非中共中央乃是蓄意任運動自流，否則作為運動具體操辦者的鄧小平，也難脫對相關標準重要性認識不足和對其出台時機遲誤的過失。

綜合以上對鄧小平在整風、「反右派」中地位與責任的分析，可以對鄧小平在運動中的角色，進行更清楚、精要的歸納：第一，對於運動有關的重大決策（整風醞釀、發動，轉折為「反右」、加大「反右」力道），鄧小平全程與聞，與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保持同調的立場，並在資訊提供與對策擬議上，發揮其他政治局常委無可並提的作用。第二，對於運動的執行與推進，鄧小平秉承毛澤東的旨意，藉黨總書記的身分，

註⑤ 1957年7月11日，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也曾談到在運動中「發生了簡單粗暴情況」和「把右派擴大化」的趨勢，並要求給各地打招呼。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第37次）紀錄，1957年7月11日。沈志華，前引稿。

註⑥ 「鄧小平同志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前引文，頁28。

註⑦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72。

註⑧ 馬永順、朱雨滋、齊翔安編，齊燕銘紀念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頁263、451。

註⑨ 錢信忠，「憶小平同志關心醫務衛生工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上冊，頁279。

註⑩ 薄一波，前引書，頁641-644。

以中央的名義全面規劃並監督運動的進程、步驟和重心移轉，直接統帥、調度中共各級黨組織貫徹運動目標與方針，並佈置、過問「反右」的重點和對象。第三，對於運動的影響與結果，運動之能以按中共意圖漸次推展，與鄧小平的張羅、驅策直接相關；「反右」之所以流於走火蔓燒，也與鄧小平的激勵、催促不可分割。簡言之，鄧小平是中共 1957 年推行此一運動，尤其是「反右」階段的首要組織者、號令手以及急先鋒。

「文革」結束以後，中共開展「撥亂反正」的工作。當年被打成「右派」者，經「冤假錯」案的平反後，維持原案者不及 1%。即便這「一小撮」的立案真能站得住腳，但是 99% 以上都證明為錯案的光怪情形，就足以突顯出運動本身的荒謬與不合理。然而，在 1957 年「反右派」中處於重要位置、表現積極有勁的鄧小平，卻「一言定奪」，堅持認為「反右」是「正確的，沒有錯」、「必要的」，若有可議之處就是將之「過大化」。^⑩

鄧小平這種「球員兼裁判」下「有前提的省思」，更被中共官方奉之為聖諭，迄今仍作為解釋該歷史必須依循的圭臬。就追求歷史事實的角度，其實為一座橫亙於所有關心相關歷史者面前的一座人造的「大山」。檢視 1957 整風、「反右派」關鍵人鄧小平在其中角色，或算是「愚公移山」的一個初步嘗試。

最後，本文的探討，除對鄧小平個人歷史與中共相關政治史有補遺拾闕的作用，其也具有如下的現實意義：^⑪

首先，深化對鄧小平此一政治人物的認識：本文揭示鄧小平在 1957 年整風、「反右派」中的關鍵角色，並不意在重新評價鄧的整個歷史功過。因為鄧作為促進中國大陸現代化與經濟發展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其所享有的崇高歷史地位與聲譽，並不會因其在 1957 年相關事件中的作為受到還原而遭到撼動。然而，重建鄧小平在整風、「反右派」中的面貌，確能有助於進一步理解鄧小平在後來其他重大歷史決策與事件中所作的思慮。以極具爭議性的 1989 年「天安門事件」為例，一方面，從「反右」中鄧小平對「右派」的嚴厲回應，同鄧在 32 年後悍然下令清理北京天安門示威活動的舉措相聯繫，可以顯現其為保衛共黨政權，不惜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意志與心態的延續；另一方面，從「反右」中鄧小平對運動擴大化的實際參與、甚至作為主要推手的親身經驗，或也可作為分析鄧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何以有意識地不擴大範圍持續追查「反革命份子」的參考因素。^⑫

其次，突顯「反右」相關研究全面開放與否的政治意義：中共對於重大歷史事件與關乎其黨國要人聲譽的問題，向有一套具強制性的說法、觀點和處理方式（主要表

註⑩ 鄧小平，「關於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鄧小平文選（1975—1982 年），頁 335。

註⑪ 有關本文的研究，最後應突出其所具之現實意義的問題，作者感謝匿名審稿人對此的提示和建議。

註⑫ 關於「反右」運動的政治遺產與影響問題，作者訪談的中國大陸相關學者中，有兩位皆不約而同地指出，鄧小平深知「反右」擴大化的教訓，因此其雖在 1989 年決定鎮壓異議分子，然沒有像 1957 年那樣事後進行大規模的「秋後算帳」。

現在其官方《歷史決議》地位的不可撼動，以及對背離相關論述的取締與制止)。^⑭如本文聚焦的問題，既涉及「反右」，又關連中共官方甚予推崇的政治人物，可謂是「雙重敏感」議題。因此，在「反右」至今過了半個世紀、鄧小平逝世屆滿 10 年，相關的議題不但無法在中國大陸境內自由地討論，相反地，出現的竟是一種人為操控下的異常緘默。

這反映中共官方不但不願正視其過去施政作為和所屬責任問題，反而利用其對傳媒、輿論的控制，以達言論一律、口徑一致的目的。^⑮如此與中共當年發動「反右」、壓制「雜音」的政治思維，是否有些許相仿？尤有甚者，有關 1957 年中共發動整風、「反右」一事，若一直無法真正悉心面對，當年「右派」「以言獲罪」、「因言定罪」的前例，也將如同陰霾一樣繼續在民間社會中揮之不去。因為與當道相左的異議之聲，因沒有言論上的明確保障與政府自身須相應遵守的規範，而或有步入早期「右派」後塵、打成「另類」的可能與風險。從此意義來看，昔日的「反右」能否確實獲得反思，並從中記取教訓、結合現況改進，對於中國大陸當下以至於未來的健康發展，皆有迫切的需求和指標性的意義。

* * *

(收件：96 年 5 月 4 日，三審：96 年 9 月 5 日，複審：96 年 9 月 11 日，第 1 次修正：96 年 9 月 13 日，
第 2 次修正：96 年 10 月 31 日，接受：96 年 11 月 2 日)

註^⑭ 相關的探討可參閱：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下冊（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 年），頁 646-671、680-688。

註^⑮ 有關中共在延續政權的同時卻迴避其往昔歷史責任的問題，可參閱：程映虹，「國家罪錯、政府責任和公民意識」，*當代中國研究*（普林斯頓），第 1 期（總第 88 期）（2005 年 3 月），<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50111&total=88>。

Deng Xiaoping's Role and Activities in the Rectification and Anti-Rightist Campaign of 1957

Yen-lin Chung

Ph.D. Stud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Although the rectification and Anti-Rightist Campaign of 1957 had passed for fifty years, there are still lacking of research on some importan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igures'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movement. Based on ex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s and depth interviews, this article tries to recover Deng Xiaoping's obscured history in the movement.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Deng not only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these controversial policies, but also took charge of implementing and supervising this movement owing to Mao Zedong's orders. Deng's strong loyalty to the Party, and his party career. Deng launched harsh attacks on the so-called "Rightists" without any sympathy and due considerations. It eventually led to excessive and counter-productive results. Undoubtedly, Deng should take the second great responsibility to this serious political event next to Mao.

Keywords: Deng Xiaoping; rectification; Anti-Rightist Campaign; General Secretary of CCP

參考文獻

- 「天津各界人士對鄧小平同志報告的反應」，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北京），總第2343期（1957年10月26日），頁6~8。
- 「北京市委7月5日鄭天翔傳達鄧小平整風報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鄧小平反動言論（北京：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資料組編印，1967年），頁20。
- 「叩訪富強胡同六號」，博訊新聞網，<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5/01/200501301027.shtml>。
- 「廣西省平樂專區和橫縣大批餓死人的情況」，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北京），總第2180期（1957年4月16日），頁3~6。
- 「鄧小平同共青團省、市委書記的談話（1957年5月31日）」，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鄧兵團編印，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文章匯編（文革時期揭批材料），第2集（1967年），頁30~36。
- 「鄧小平同志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反右文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特殊館藏，頁23~29。
- 「鄧小平在清華大學的講演」，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鄧兵團編印，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文章匯編（文革時期揭批材料），第2集（1967年），頁4~19。
- 「鄧小平對共青團省、市委書記會議的黑指示（1957年9月3日）」，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鄧兵團編印，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文章匯編（文革時期揭批材料），第2集（1967年），頁36~38。
- 「濟南市幹部、群眾對鄧小平同志報告的反應」，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北京），總第2344期（1957年10月28日），頁3~4。
- 于光遠，我憶鄧小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山東省志（大事紀），中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
- 中共山西省委，「山西人民永遠懷念小平同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68~84。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吳殿堯主編，朱德年譜，新編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 中共北京市委，「鄧小平同志對北京市的關懷和激勵」，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1~32。

- 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壯鄉人民永遠懷念敬愛的鄧小平同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286~301。
- 毛澤東，「1957 年夏季的形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6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543~553。
- 毛澤東，「對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稿的批語和修改」，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6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584。
- 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台北：允晨文化，2001 年）。
- 李向東、王增如，**丁陳反黨集團冤案始末**（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
-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年）。
- 李輝，「與張光年談周揚」，**學術中國網**，<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4029>。
- 李輝，「與李之璉談周揚」，**學術中國網**，<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4031>。
- 李羅力編，**偉大生命的歷程—鄧小平全記錄**（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年）。
- 杜光，「中央高級黨校反右派內幕」，**炎黃春秋**（北京），第 9 期（2005 年），頁 1~8。
-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未刊稿）。
-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下冊（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 年）。
- 程映虹，「國家罪錯、政府責任和公民意識」，**當代中國研究**（普林斯頓），第 1 期（總第 88 期）（2005 年 3 月），<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50111&total=88>。
- 胡績偉，**胡績偉自述**，第 2 卷（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 年）。
- 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師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
- 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年）。
- 馬永順、朱雨滋、齊翔安編，**齊燕銘紀念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 年）。
-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年）。
- 張國星，「關於右派的人數和性質」，**黨史博覽**（鄭州），第 6 期（2005 年），頁 50~51。
- 郭小川著，郭曉惠、郭小林整理，**郭小川 1957 年日記**（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 陳徒手，**人有病天不之否：1949 後中國文壇紀實**（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年）。
-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 年）。
-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
- 當代廣東研究會編，**嶺南紀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
- 滿妹，**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 年）。
- 錢信忠，「憶小平同志關心醫務衛生工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276~280。
- 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人民日報**（北京），1957 年 10 月 19 日，第 1~3 版。
- 鄧小平，「堅持黨的路線，改進工作方法」，**鄧小平文選（1975—1982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238~347。

-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255~274。
- 鄧小平，「關於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334~337。
- 鄧小平，「共產黨要接受監督」，鄧小平文選，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70~274。
- 黎之，「回憶與思考—整風、鳴放、反右」，新文學史料（北京），第1期（1995年），頁92~107。
- 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修訂版（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
-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 鍾文、鹿海嘯編著，百年小平，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
- 鍾灝編著，鄧小平的理論與實踐縱覽（1938-1965年）（北京：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
- Goodman, David S. G., *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4) .
- MacFarquhar, Roderick ed., *The Hundred Flowers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New York: Praeger Inc., 1960) .
-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
- Pye, Lucian W., "An Introductory Profile: 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5 (September 1993) , pp. 412~443.
- Ruan, Ming, *Deng Xiaoping: Chronicle of an Empir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
- Yang, Benjamin, *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 (Armonk, N.Y.: M.E.Sharpe, 1998) .